

以真淳之筆，寫港澳故事

——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的啟示

吳志良



五月十日，廣東廣州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電影主角葉淑柔給丈夫鄭木生寄的照片和紙飛機。

七日談

澳門篇

一部成本僅一千四百萬元、首日排片不足百分之二的方言電影，至今斬獲超十七億元人民幣票房——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創造的不僅是票房奇跡，更提供了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命題：在這個算法推薦主導、流量邏輯至上的時代，樸素真誠的敘事何以擁有如此強大的穿透力？而當我們把目光從潮汕僑鄉投到珠江口，會發現在僑批百年的歷史長卷中，港澳本來就是濃墨重彩的篇章。如何借鏡這部電影的創作智慧，講好港澳故事，值得深入探討。

僑批的歷史，從來不只是潮汕或閩南一隅的故事。在這張跨越東南亞與中國東南沿海的龐大網絡中，香港扮演著心臟般的角色，澳門則是特殊年代裏不可或缺的生命通道。

香港的僑批故事，首先是一部金融史。十九世紀中葉以降，隨著香港開埠成為自由港，大量僑批以此為樞紐完成匯兌中轉。彼時東南亞各國貨幣波動頻繁，而港幣憑藉相對穩定的幣值，逐漸成為僑批網絡中的「通用貨幣」。許多華僑在南洋辛苦攢下的血汗錢，要先兌換成港幣，經由香港的批局匯往僑鄉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中，主角從泰國寄回的僑批上標註的正是「港幣」，這一細節透露出歷史的真實——在無數僑鄉家庭的記憶中，「港幣」本身就等同於「僑匯」。據統計，香港鼎盛時期有超過三十家批信局專門處理僑批業務，像創辦於一八五六年的德利批

局、一八八六年的潘合利批局，至今仍有檔案可考。新中國成立後，面對部分僑居國的限制與封鎖，香港更成為維持僑匯生命線的「反限匯」主通道。

與香港的金融樞紐角色不同，澳門在僑批史上的意義，更體現於物資寄送與情感傳遞的特殊功能。上世紀中葉物資匱乏的年代，不少華僑通過澳門這條通道，將糧油、布料、藥品寄往內地親人手中。這些包裹裏的僑批，不僅匯去了錢款，更寄去了實實在在的生存希望。位於澳門老街的「保安和」等商號，仍保留著當年的僑批單據，成為這段歷史的沉默見證。

可以說，沒有港澳的金融網絡與物流通道，整個僑批體系都難以如此高效地運轉近一個半世紀。這是一筆屬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文化遺產，也是一座尚待開掘的故事富礦。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的成功，首先在於它對「煽情」的斷然拒絕。這恰恰是當下許多主旋律創作和地方文化敘事最容易跌入的陷阱——急於感動觀眾，反而讓觀眾無感。

影片最動人的一幕，是兩位老人暮年重逢。編劇刪去了抱頭痛哭的慣常橋段，代之以一句家常的問候：「鹹豬肉你收到了嗎？」數十年的思念、虧欠與守望，盡在不言之中。導演藍鴻春在東南亞採訪數百位老華僑時發現，真實的人生從來不按照戲劇套路運轉——那些經歷了生離死別的

人，反而最不會在公開場合宣洩情感。於是，影片選擇了「以無勝有」的東方留白，讓悲傷沉入歲月深處。

這種克制，恰是僑批本身的氣質。翻閱僑批文物，最久遠的一封是清光緒七年葉和仁寄給母親的家書，信中不過囑咐妻子「洋銀式大元，以為母親買肉之貨」。一九二七年華僑陳君瑞寄回的僑批，正中只寫一個大大的「難」字——千言萬語凝為一字。這些樸素的言語，不是加工過的抒情，而是凡人日常中真實的惦念與擔當。正如電影主創所言：「所有僑批文案都源於真情實感，若是連自己都不能被打動，就不能寫出好故事、拍出好電影。」

歷史有血有肉，文化就是煙火人間。當我們試圖呈現香港百年滄桑或澳門中西交融時，與其追求宏大敘事和價值宣導，不如沉潛到凡人日常的煙火之中，讓故事自己說話。港澳的故事，不缺跌宕起伏的戲劇性，缺的是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那種把戲劇性壓下去、把日常性浮現出來的定力。

試想香港的僑批故事。那些在上環德輔道西的批局裏，經手萬千僑匯的「批腳」，走街串巷、風雨無阻，將南洋的血汗錢一筆一筆送到等待中的婦孺手中。當中的誠信與堅守，足以寫成一部商道史詩。又或者，一位長年往返於香港與東南亞之間的水客，在輪船上寫下給阿嬤的家書，信封裏夾著幾張港幣——這樣一幅風景，本身就是一部電影的開場。

澳門的故事也如是。大三巴腳下的老街，曾經有多少澳門婦人像電影中的阿嬤一樣，一邊操持家務，一邊遙望遠方？又有多少華僑子弟，經由澳門寄出的物資，度過了饑饉的童年？這些故事不需要刻意煽情，只需以平實的筆觸還原其真實的肌理——那間老商號櫃台上的算盤聲，那張泛黃僑批上的問候語，那些在碼頭等待僑批到來的日日夜夜——就足以直叩人心。

關鍵在於創作態度的轉變和創作路徑的回歸。不是先預設一個「講好港澳故事」的任務，然後尋找素材去填充；而是真正走進港澳的街巷、老店、社區，去傾聽那些仍然健在的老者講述，去觸摸那些尚未湮滅的實物，讓故事從土地裏自然生長出來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花了數年時間在東南亞做田野調查，影片中九成以上的情節源於真實素材——這種「笨功夫」，正是當下文化創作最稀缺的品質。

從更大視野看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遠不止於一部電影的成功。它證明了以真淳之筆書寫和樸素方式講述的中國故事，幾乎可以不借助任何流量加持和宣傳造勢，憑口碑發酵便引發現象級的文化共鳴。

對港澳而言，僑批文化是連接內地、溝通歷史與當下的一條情感紐帶。這條紐帶承載的，是中華民族重信譽、守承諾的精神品格，是海外遊子濃厚的家國情懷。講好這樣的故事，既是对歷史的致敬，也是對當下社會心理的回應——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，人們渴望真實，渴望樸素，渴望那些不加修飾卻直抵人心的情感。

港澳的文化敘事，可以從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中獲得滋養與啟發：能打動觀眾的最好故事，不需要聲嘶力竭的刻意煽情；最深沉的力量，往往就藏在尋常煙火之中的人性真與善。

一字緣起



如是我見 金卯刀

高中一堂語文課上，張先生發問：「行李」的「李」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同學們紛紛猜測，有人說是姓氏，有人解作果樹，也有人認為是通假字。張先生聞言只是一笑，並未作答。這個疑問化作懸念落在我心底。三十餘年悠悠而過，它始終縈繞不散，想來，這便是我對漢字萌生探究興趣的開端。

我的筆名「金卯刀」，源自繁體「劉」字的拆解。劉是再熟悉不過的姓氏，可它最初的本義是什麼？大約從二〇一四年起，我便常在閒談中和友人探討這類漢字謎題，美其名曰「席間說字」，其實就是隨性聊天，不求嚴謹，但求趣談。但我一直恪守一個原則：溯源字形，一個字就是一幅畫，義從畫出。後來我開設公眾號，斷斷續續撰文落筆，起初並未刻意深耕，行文零散，也談不上專業考據。

十餘載光陰，一路思索，一路積累。這些零散的文字，如同散落的鮮果，始終缺少一條主線將其串聯。在那些果實之中，最沉甸甸的一顆，便是那個讓我糾纏三十餘年的「李」字。

「李」的上木下子，並非枝頭孤果，而是一樹繁實，纍垂垂枝。細細想，這不正像遠行之人？肩扛背負、行囊滿身，步履沉沉。古人遠行多靠徒步，出使、赴考、經

商，動輒數月漂泊。行旅之人背負的行囊，恰似李樹承托滿樹碩果。

這便是漢字獨有的妙思：以一幅具象畫面，聯通兩層意涵。不靠邏輯推演，全憑視覺共情。行旅為擔，李果為負，字與人事，渾然相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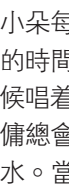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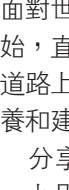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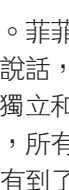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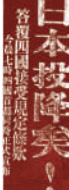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當年的張先生，是否認同這份解讀。但正是那一堂課、那一個問題，為我的「說字」之路拉開了序幕。

幸而在友人敦促與助手協助下，這份心願終得落地。從選題策劃到書稿成型，亦承蒙諸多師友提點相助。

即將成型的書名擬定為《一字見中國》，這也是與諸位師友反覆斟酌而定。最初擬名《從52個漢字讀懂古代中國》，數易其稿，終定今名。這裏的「一」，既是本書的起點，也是三十多年前那堂課上懸而未決的「李」字。所謂「一字」，是循一字一畫，回望先民造字之態；所謂「見」，是用心觀照，跳出抽象概念，重回遺古現場，看見古人眼中的天地人間；所謂「中國」，並非單指一方疆域，更是綿延不絕的華夏文明。五十二個漢字，便是五十二幅文明圖景，藏著華夏從拓土開荒到精神安棲的文化脈絡。

站在學術角度而言，本書或並無獨到創見，不過是將舊日零散文稿匯編，數度打磨而得。但那些文字如若擱置一旁，未免辜負多年的點滴求索，和先生當年的「一字之問」，於我內心，也終歸是一種缺憾。

大公報 大公報人物志 ⑤ 李春陽



王芸生一九〇一年生於天津，幼讀私塾，十三歲起在茶葉店、布店、木材店做學徒，把《史記》《漢書》讀得捲了角，為了做打字員，還自學了英文。一九二六年，他先後加入國民黨和共產黨，是特殊年代裏極少數的跨黨黨員。因為與張季鸞打筆仗，受到張季鸞的注意，一九二九年加入《大公報》，到一九六六年止，在《大公報》工作了三十七年。一九四一年張季鸞去世後他接任總編輯，主持《大公報》編輯業務。

一九三一年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張季鸞和胡政之決定在《大公報》設立新的編輯方針——明恥救國。「蓋使國民仰漢唐之盛，悲今天之衰，亦以證明中日文化淵源之深厚，而責日本凌壓中國之暴殘。」指派入館不久的王芸生收集資料，梳理甲午以來的中日關係史。

王芸生稱自己從那時起「史運亨通」，他奔走於平津之間，遍查故宮博物院和北京圖書館的文獻史料，拜訪歷史學者袁同禮、王希隱等，曾擔任駐日公使的李盛鐸，亦向他提供重要的史料。這項研究計劃始於一八七一年《中日修好條約》的簽訂，準備寫到一九三一年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整整六十年，定名為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。內容寫到一九一九年時，因報社事務繁忙，暫為擱筆，實際寫出的部分計四十八年，王芸生為此付出了心血。

兩年多時間中，它在《大公報》上連載，後由《國聞週報》轉載，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，王芸生此後被視作中日問題專家。日本人很快將此書翻譯成日文出版。一九三四年國內出版了單行七卷本，近兩百萬言。蔣介石讀後，邀

王芸生



請王芸生赴廬山授課。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也傳到了延安，成為毛澤東的案頭參考。史學家劉大年說，「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，依靠它才得以披露於世，為人們所知。書名標舉中國與日本，實際涉及中美、中俄等更廣泛的範圍。」

一九四二年中原饑荒，河南災民三千萬，《大公報》派出記者入災區採訪，《豫災實錄》發表後，王芸生撰寫社評《看重慶，念中原！》，質問「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，還照納國課，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為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，並限制一般富有者『滿不在乎』的購買力？」社評發出後，蔣介石下令《大公報》停刊三天，復刊後的《大公報》發行量大增。

一九四七年王芸生以《大公報》總編輯身份，應盟軍司令麥克阿瑟之邀赴投降後的日本考察，他歸來後寫了十二篇文章《日本半月》，在《大公報》上連續刊出。

一九四八年《大公報》香港版發表

王芸生的社評《和平無望》，標誌著《大公報》的立場轉向未來新中國的主人，他在香港逗留的三個月裏，親自主持港版言論，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。

一九五三年上海《大公報》與天津《進步日報》合併後遷入北京，王芸生繼續擔任大公報社長，直至一九六六年停刊。

一九七二年九月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，毛澤東讓人找出一九三四年的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一書，作為參考資料。在會見過程中，毛澤東兩次提到王芸生，並對周恩來說，應該讓王芸生參加接待活動。此後，王芸生的生活待遇與醫療條件得到改善，一九七三年他作為外交使團的成員再度訪問日本。

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，王芸生病逝，享年七十九歲。趙樸初輓詩云：「少年苦學歷荆榛，終作浮天擊水鯤。人海燃犀嘗燭鬼，論壇主筆仰扶輪。朝宗百折溪流志，報國千端老病身。十載論文風雨共，淚揮遺著勉重溫。」

一九四五年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談判，期間多次與主持《大公報》的王芸生見面、會談。王芸生勸說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，毛澤東回答說「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，而是國民黨灶裏不許我們造飯。」

修訂並完成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，是王芸生晚年最大的願望。一九七九年王芸生自感體力不支，在朋友的建議下，初版中未寫的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一年中日關係史部分，王芸生委託《大公報》張蓬舟，以大事記的形式終於補足為全書的第八卷。

媽媽的耐心與克制



喧暖人生 香寧

小學的一堂美術課，我們要為一條熱帶魚填色。每個小朋友都有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筆。我想像著記憶中對魚的認知，低頭在魚身上作畫，很多顏色，層層疊疊畫好了。美術老師非常喜歡，他拿著我的熱帶魚到處展示，要我參加美術興趣班。爸爸說，別折騰那些，搞點有用的。去學個鋼琴。發現我完全沒有音樂細胞後，妥協讓我學書法。至少字如其人，你把字寫規整也是好的。長大工作後，我帶他們逛畫展，還會調侃他們，如果當初我繼續畫畫，說不定白牆上，也有我的畫了。爸爸不接我的話，只專心地看那些畫作右側的標價，表示不可思議。

想起這幾十年前的幼年往事，是因為早上聽到了菲菲和她五歲女兒小朵的溫馨故

事。菲菲是個很開明的媽媽，女兒小朵自從能說話，自己跑跳，她就有意識地培養小朵的獨立和自主性。做父母的不要認為孩子太小，所有事情都應該父母代勞，更不要覺得只有到了十八歲，才能讓孩子真正意義上獨立面對世界。事實上，從孩子有意識和記憶開始，直至法定成年，做父母的都應該在這條道路上，用最大的耐心和克制來引導他們培養和建立屬於自己的人生觀。

分享菲菲關於耐心和克制的兩個小故事。小朵五歲了，可以自己洗澡。菲菲留意到小朵每到洗澡的時候，會比大人洗澡用更多的時間，小朵喜歡洗澡，還常常在洗澡的時候唱著自己喜歡的歌。最初菲菲的父母或菲備總會跑去喊小朵，讓她快點洗完，不要玩水。當菲菲透過浴室的嘩嘩水聲和小朵開

心的歌聲，她感受到的，是女兒無限的快樂。菲菲提醒身邊的大人，這是一段小朵自己享受的時間，若她因此而開心，何必掃興。在溺愛和理解之間，父母是需要掌握分寸的。由著孩子的性子做錯誤的事情和尊重孩子的某些小嗜好，是不同的。

而關於克制，源自扣衣服釦子。小朵每天要坐校車，當她學會自己給衣服扣釦子之後，就很堅持要自己來，有時候差點趕不上校車，家裏的老人和菲備總忍不住幫忙，扣完了就好讓小朵快快上校車。菲菲自己也說忍不住想幫忙，但後來她還是克制了。提前幾分鐘讓小朵換衣服，給她時間扣釦子，當小朵第一次靠自己一個人完整扣上了所有衣釦，小朵特別自豪和開心，菲菲也很欣慰，這樣的克制帶來了女兒每一次小小的成

長。相形之下，我也見過有的孩子，小學四年級了，連鞋子還穿不好，甚至還不是綁鞋帶的鞋子，只是魔術貼鞋。一問才知，老人從孩子小時候就是這樣事無巨細給孩子做一切。不知道還有多少這樣的例子，而孩子的父母卻完全意識不到這有任何問題。

不知在哪裏看過一句話，我們從小就接受教育，會算數，會寫字，人生中很多角色都有課上，唯獨做父母，得自學成才。菲菲說，有了小朵之後，我也在成長，學習和孩子相處，學習如何做一個好母親，學習耐心與克制。小朵很幸運，願更多的為人父母，都找到與孩子的相處之道，在路漫漫的人生裏，和孩子一起成長。